

南非 J.C.坎尼米耶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王敬慧 译

J.M. J. M. Coetzee:
A Life in Writing

库切传

[南非] J.C.坎尼米耶 著

王敬慧 译

J.M. J. M. Coetzee:
A Life in Writing
库切传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J.M. Coetzee: A Life in Writing by J.C. Kannemeyer
Copyright © 2012 by J.C. Kannemeyer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etherlands in 2012 by Uitgeverij Cosse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Zhejiang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3-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J.M.库切传 / (南非) J.C.坎尼米耶著; 王敬慧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339-4744-6

I. ①J… II. ①J… ②王… III. ①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传记 IV.
①K834.7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04668号

J.M.库切传

作者: [南非] J.C.坎尼米耶
译者: 王敬慧
责任编辑: 童炜炜
装帧设计: 杨林青工作室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字数: 569千字
印张: 41
插页: 16
书号: ISBN 978-7-5339-4744-6
定价: 168.00元(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J.M.库切传》 中文版译者序

本译本中，对库切的称呼有两种方式，同事、朋友和亲人称呼他：约翰（J.M.库切的J是John的首写字母）；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称他为J.M.库切，中国读者群常采用后一种称谓，并去掉首字母。如果为中国读者一句话总结该书：它是对库切生活与创作的工笔画白描，精细而巧密。在您进行文本阅读前，请允许译者解释三个问题：

1. 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对译者而言，来自于一种使命感以及对库切本人的感激。十几年前，当库切得知译者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他的文本，并打算在中国出版一本库切传记时，他除了耐心回应译者的学术问题以外，也非常支持其传记的出版工作，甚至亲自扫描老照片并授权给译者用于新书之中。2011年，译者所著的传记《永远的流散者》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时，译者将汉语版本的梗概翻译成英文，连同书籍本身一并寄给他。译者知道他也许并不关注该书中他走过人生道路的重述，但是在中文版的图书中看到家人的照片，应该是令他很感慨的事情。2013年在库切与莫言北京对话活动中，库切告诉译者另外有一位南非教授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框架与译

者的传记相近，但是内容更为丰富，是700多页的大部头，于是译者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个�息告诉库切图书在中国出版界的伯乐——曹洁女士，希望中国读者可以有更多视角了解这位作家。作为比较了解库切作品的学者，译者受委托来翻译这本图书，库切本人也表示欣慰和放心。对此委托，译者欣然接受，因为译者衷心希望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这位伟大而内敛的作家，并阅读他的作品。可能是因为译者是教师的缘故，有一种很强的助人情节，看到一本好书，或知道一位好作家，总想向更多的人推荐。而库切是如此值得读的一位作家，他又从不谄媚地讨好读者、编辑或媒体。他悲悯而绝望地审视着芸芸众生，探究着我们每个人内心潜伏的兽性，平静而敏感地描绘着我们所有人类都会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译者希望通过此译本帮助搭建一座他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因为译者的功能就是帮助沟通成为可能。

2. 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一定要了解库切？译者的亲身感觉可以部分解答这一疑惑。十几年前的一个深夜，因为错过了最后一班校车，译者待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里，书海中找到库切的《等待野蛮人》，读完的感觉犹如饮了一杯醇酒，至今仍回味不止。关于什么是野蛮的问题，如果世人真的有些许洞悉，哪还会有无数的争端！关于该作品的最佳评论来自荷兰的一位学者兼作家弗兰斯·凯伦敦克（Frans Kellendonk）：“如果将库切的作品过于狭窄地与他祖国的悲剧相联系，那是错误的。他所描述的种族隔离是非政治的，是存在主义的。种族是一种迷信，种族主义与反种族主义都是错误的陈述。它实际上在讲述承认与尊重真正的差异，这是文化的问题。人只有在保持不同的情况下，才是平等的。”一位来清华讲学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教授也曾经对笔者感叹，他认为库切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也许这种判断只是个人见解，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库切的文字深邃而感人，同时需要比较具有感悟力的读者。如果您像笔者一样觉得自己的感悟力有待提高，让笔者用自己的经验告诉您，在阅读他文字的同时，个人的思考可以被引领着向深刻的方向前行。

3. 那么为什么要读库切传记？首先，他的传记可以提供给读者许多有助于理解他作品的背景材料，这恰恰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感悟力；其次，他的传

记从狭义上讲，能够让读者明白一个喜欢文学创作者从尝试写作到被世界接受的过程中所要走过的路；从广义上来讲，它能帮助读者了解世界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尽管传记里没有理论化的说教，但是读者可以通过库切在澳大利亚、南非、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各国学术机构的教学科研经历，了解到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国外诸多高校英文系的学科发展脉络与学术斗争常态。读者总觉得作家库切不愿意袒露自己，但是读过这本传记后，您或许会明白库切不是不愿意讲自己，而是期望通过他的作品讲述他的心声。从这本传记中，您一定会找到一些曾经想知道的有关他的秘密，也会更加走近他作品创作的原点。

翻译不仅仅是将文字从一种语言转入另一种语言，对于译者而言，它是一种译者细读文本、不禁反观自身的过程。库切开始创作的时候，译者才刚刚出生，库切在用红笔一次次认真修改草稿的时候，译者正坐在老家平房门前的木墩上迷茫地想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那时的译者并不知道将来自己要做什么？会过什么样的生活？但是记得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可以亲眼看到真正的北京天安门，从未奢望过自己将来要在北京工作，甚至在后来会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游走。尽管一直生活条件简朴，但是吃过的苦与库切相比少之又少，没有颠沛流离，没有父母失和，也没有学费拮据。还有一点不同：库切几时要努力找书读，而译者父亲节衣缩食购得的中外文学名著给了译者一个相对精神充实的童年。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库切可以将一本《堂吉珂德》看上几十遍仔细研读，而图书的随时可得却让译者养成了读书不精、囫囵吞枣的恶习（尽管译者时常安慰自己：那些读过的文字应该已经深深刻在大脑的52区，随时等待着被挖掘）。还好，因为学术科研的需要以及个人兴趣的驱动，在过去的十几年间，译者精读了库切的所有作品，通过对库切文字的反复细读，重新理解那些被忽略的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文学本质内容。库切曾说他对贝克特文本的反复阅读影响他的说话，甚至思维习惯，译者对库切文本的阅读也有同感。库切犹如译者的“耶稣”，诚如一位批评家对库切的评价，“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作家愿意袒露自己的后背，用自己手中的棍棒打自己，宣称自己是人类苦难的一部分，也是让人类遭受苦难之源的一部分。”

苦难成就了库切的当下。

大多数中国读者知道库切是从他获诺奖开始，而将库切与另一位诺奖得主布罗茨基相比较，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看到中国哲理故事塞翁失马的普适寓意。库切二十几岁在英国IBM工作，同时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从广播中听到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歌，其中一句人生“漆黑如针胆”让他深有感触。试问，我们每一个人，在年轻时代是否都有感到过漆黑无光的时刻？库切的《青春》一书给我们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因为社会寄生虫的罪行，他[布罗茨基]被判在冰封的北方阿尔汗格尔斯克半岛服五年苦役，现在仍在服刑过程中。就在他[库切]坐在伦敦自己温暖的房间里，小口喝着咖啡，一点点地咬着有葡萄干和果仁的甜品的时候，有一个和他同龄的人，和他一样是个诗人的人，在整天锯着圆木，小心保护自己长了冻疮的手指，用破布补靴子，靠鱼头和圆白菜汤活着。”布罗茨基是在1987年获得诺奖，库切获奖则是在2003年。这样的结果用英文来描述，只要三个词：“fortune in misfortune”（生活中的灾难其实是一种财富）。请容译者卖个关子，读这本书，您还可以继续体会这寓意的内涵。

库切的文字有着救赎的作用，但他不是圣人。作为译者，我在揣摩文本文字的同时，也在揣摩库切的人生，也在从深层次审视和询问自己，尝试从该书中了解库切的作品、看他的为人，其中有什么是要学习的，什么是要避免的？库切是一个相对悲观的人，他对人性的弱点相当敏感和消极；而译者倾向于对此忽略不计。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苦难的经历，但是那不应该是我们感到不幸或者怀疑世界的缘由；苦难的经历也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感悟，可以是进步的动力，让我们更有效地找到生活的目标，有更多的担当。与其抱怨世界缺乏关爱，不如先主动付出自己的关爱，如孔子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本人有无数顿悟时刻，有时会掩卷沉思，有时会会心发笑，更多的时候是欣慰，觉得能够翻译此书真是一种幸运，因为翻译的过程给译者机会思考如何成为一名更好的社会成员、更好的家庭成员。所以，译者也衷心盼望读者您能从中找到您与作家库切的契合点。也希望该传记能引发您的些许兴趣，有好奇心去深读库切的某本作品，与他

进行进一步思想与灵魂的交流。读这本书，您一定会得到什么吗？译者没有肯定的答案，但是译者可以确定的是，您可以在阅读中，看到一位成名者背后必然经历的诸多艰辛，也许能随之消除自己心中的某些愤懑、压抑与不安全感。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得到清华大学外文系，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中心众多学者、同仁的大力支持，他们所提供的时间与空间，让译者得以全力进行该书的翻译。去国外的相关访学交流费用来自于我本人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后现代社群与库切文本研究（15BWW009）。此译本的完成也将是该课题成果的一部分。在目前翻译基本不算学术成果，翻译报酬不足以让人谋生的大环境下，该项社科基金的意义与作用尤为明显。另外，还要感谢清华大学的张萍老师，她在外文系系务会的批准下，欣然同意与译者合上一门课程，从而使译者有相对完整的一段时间用于翻译文本的主体部分；同时还要感谢我所指导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研究生张思奇。她在校稿过程中如此用心与细致，秉承了库切的完美主义精神！她本人也在中国澳研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库切研究论文，得到澳洲教授的高度赞扬。译者也衷心希望她从中找到自己未来的学术发展方向与前行的动力。最后还要感谢来自南非的露西亚·塞克斯教授，她帮助译者校对书中所有阿非利堪斯语的词语与杂志名称的英文翻译。另外巧合的是，交流中，译者得知塞克斯教授2010年在开普敦大学访学时，所用的办公室就是库切所用过的那一间。世界有时很小，仅仅翻译一本书，就有如此多的机缘巧合，而读书也要随缘。随缘——惜缘——结缘，人生如此，读书亦如此。

衷心希望您也可以结缘于这本传记。同时，翻译中有不周之处，恭请批评指正！

王敬慧
草于清华园
2015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幕

身世，青葱岁月与初期创作（1940—1961）

第1章 “我的历史迷宫”：祖先与根 13

第2章 童年 32

第3章 圣约瑟夫圣母学校（1952—1956）..... 61

第4章 开普敦大学求学时代（1957—1961）..... 77

第二幕

英国间奏（1962—1965）

第5章 伦敦与布拉克内尔（1962—1965）..... 111

第三幕

美国（1965—1971）

第6章 得克萨斯州奥斯汀（1965—1968）..... 141

第7章 纽约州布法罗（1968—1971）..... 166

第四幕

南非（1971—2001）

- 第8章 开普敦大学讲师与《幽暗之地》…………… 205
- 第9章 《内陆深处》与文字审查制度…………… 259
- 第10章 《等待野蛮人》与国际认可…………… 326
- 第11章 首获布克奖与一个《鲁滨逊漂流记》式船难故事…………… 376
- 第12章 喜悦与哀痛…………… 425
- 第13章 自传体文本，《动物的生命》，《耻》及争议…………… 476

第五幕

澳大利亚（2002年至今）

- 第14章 移民…………… 543
- 第15章 诺贝尔文学奖…………… 562
- 第16章 “澳大利亚”小说…………… 585
- 第17章 “舞文弄墨”…………… 610

后记…………… 627

编者按…………… 630

附注…………… 631

前言

关于J. M.库切传记的研究开始于2008年7月，当时我重新阅读了他所有已经出版的作品并初步查阅了相关文献。我深知，我所研究的主体是一位著名作家，是世界各地大学英语研究中的核心人物。关于他作品的硕博论文有五百多本，而研究他的小说的专著，也犹如雨后春笋般以各种语言不断问世。¹2008年9月，我在南非格雷厄姆斯敦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NELM）里查阅了大量关于库切的研究资料。2009年3月，我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亲自拜访了库切本人，并在那里对他进行了为期两周深入细致的采访。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我大量复制了他授权我使用的文档，并探究了那些仍由他本人保留的手稿。对于其他的更多信息，在库切的帮助下，我与相关人士进行了联系。2010年1月1日我开始着手撰写书稿。在写作过程中，我继续调研，并于2010年4月到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访学，那里存放着大量库切的手稿。²2011年9月本书第一稿完成。

2009年3月我到阿德莱德采访库切时，他告诉我，最让他担心的是

传记中事实信息的准确性，但他绝不会干扰我对事实数据的解释。

从一开始库切就表现出非常合作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充满热情。对于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他都做出简洁的回答，但他不想被拖入任何臆测之中，尤其关于他的作品该如何阐释，他不发表意见。就连我问他觉得哪位批评家对他作品的评价最接近他的本意，他也巧妙地转移了话题，避免对此类问题做出任何答复。对于一些敏感话题，比如他与前妻菲利普·贾伯(Philippa Jubber)之间的隔阂与离婚，以及儿子尼古拉斯的死亡和女儿吉塞拉的疾病，他毫不回避，简洁明了并尽可能客观地回答了我，不论真实情况多么令人不安。

二

对于像J.M.库切这样的一位作家，研究他生平是否有意义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90年特丽萨·多维(Teresa Dovey)在她的著作《J.M.库切小说研究》(*The Novels of J.M. Coetzee*)一书中指出，在处理像库切这样的人物时，个人传记并不是那么的重要。³另一位库切作品研究专家大卫·阿特维尔(David Attwell)在其著作《J.M.库切：南非与写作策略》(*J.M. Coetzee: South Africa and the Politics of Writing*, 1993)中也非常赞同地对此进行了引用。⁴

多维和阿特维尔在发表这些言论时，库切的自传体三部曲《男孩》(*Boyhood*, 1997)、《青春》(*Youth*, 2002)和《夏日》(*Summertime*, 2009)还没有出版。但是，即便是在这三部曲出版之前，研究者可能已经在库切的作品中嗅到了自传的味道。比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说《幽暗之地》(*Dusklands*, 1974)中，他戏拟了他的祖先与他自己的历史。尤金·唐恩(Eugene Dawn)在《越南计划》中要向一位名为库切的长官汇报，而在《雅各·库切之讲述》中，“J.M.库切”作为翻译者给小说加了一篇后记：他的“父亲”对18世纪先人“最初”叙述的后记。如果研究

者知道库切家族的农场——百鸟喷泉农庄——零星地构成了他第二本小说《内陆深处》(*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1976) 的背景, 他们在那本书中也可以找到自传的痕迹。

在库切的小说《男孩》出版之前, 人们普遍低估了库切小说中自传成分的重要性, 但到了2005年, 当三部曲中的前两部问世以后, 德里克·阿特里奇(Derek Attridge) 是这样评价库切的自传体创作的: “当库切的传记作者去探究库切的生活与小说之间的联系时, 会有大量的材料可以使用, 因为即便是从目前公开的极小一部分传记信息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小说是从他的个人经验与困惑中编织出来的。”⁵

库切自己不止一次地将自传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来谈论, 并在开普敦大学教授就职演讲上以此为主题做了首场演讲。⁶在他看来, 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 包括他的文学批评, 都是他的传记, 因为他往往要对传统进行评判, 要么是与之站在一个战线上, 要么是站在对立面; 他也会评判一些作家,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对其“产生影响”, 或者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当一个作家着手记录自己的生活时, 他会从记忆的闸门内甄选。库切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曾经提到“在自传这种自我写作的形式中, 你不得不尊重历史事实。但是尊重哪些事实? 尊重所有事实吗? 不是的, 因为所有的事实实在太多了。你要选择那些符合你不断演变的特定目的的事实”。⁷

因此, 对于库切而言, 在自传体写作中, 作家对事实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即使他绝对忠于事实, 他也只是在众多的事实中选择了一些为其所用, 这样一来, 真正的传记与虚构的传记之间的关系就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了。这就是为什么库切告诉阿特维尔, “所有的自传都是在讲故事, 而所有创作都是一种自传”。⁸艺术家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忠实地再现事实, 而是要使用与处理事实。通过选择与排序, 艺术家能比历史学家更接近完整的真相, 因为历史学家往往要被事实所约束。正如马丁·范阿梅龙根(Martin van Amerongen) 所说, 自传并不是一份可以核查的简历, 而是一种阐释, 有时甚至是一件全面且自足的

艺术品，具有独特的法则与规律。⁹事实上，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认为“自传作者一半是在发现，一半是在创建并设计一种更深层次的真实，他们并不拘泥于史实”¹⁰。

随着《男孩》《青春》和《夏日》的出版，库切作品中的自传元素更加明显，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更具有欺骗性。在《男孩》和《青春》中，库切公开声称，它们是小说体自传，虽然他可能有些夸大这两本书中的虚构部分。在这两本书中，尽管库切运用了一个疏离的叙述者来讲述男孩和青年的经历，但是其中的细节与库切本人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吻合的。我大胆地认定，特别是在库切的作品《男孩》中，许多内容都是有据可查的。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我之前已经多次亲自探访了库切的百鸟喷泉家庭农庄，也与库切的多名亲属交流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夏日》是这三部自传中最令人难以捉摸的一部。正如该作品中的人物所说：“库切自己写下的东西不能被采信，不能作为一个事实记录——并非因为他是一个撒谎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虚构作品的写作者。”¹¹在《夏日》中，库切重新排列了史实，以便能够更深层次地阐述真相。

任何库切的传记作者都不得不仔细考虑真实与虚构之间这种非比寻常的关系，以及库切所用的相关且含混的叙事策略。他将不得不考虑到作家明显是在回避作者的责任，特别是要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夏日》。即使在《凶年纪事》（*Diary of a Bad Year*, 2007）中，库切的叙事策略也没有使读者从头至尾地认为书中虚构作家的观点就是库切本人的观点。在一篇关于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传记的文章中，库切显然很是赞赏这位俄国作家的写作方式，他将其称为复调小说，他认为在真正的复调小说中，并没有主导的作者意识，因此，也没有谁强调真理或权威，有的仅是相互抗争的声音与话语。¹²库切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所采纳的正是这种叙事策略。

因此，与罗兰·巴尔特一样，库切断言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¹³在我看来，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库切一样，将济慈所说的

那种本质上既无身份又无特定观点或态度的变色龙作家发挥到了如此极致的程度。这也使得传记作者的任务更加复杂，且不论捕捉这样一位作家的生命轨迹这一活动本身是多么的诱人和具有挑战性。

然而，库切传记不必仅以增进读者对库切作品的理解为要义，亦不必刻意追寻传记文字和文学批评的关联。这位作家的生平事迹与他的卓越成就本身就是有价值的，他非凡的小说激发了人们对他的兴趣。尽管库切的这种关乎自传文学、极富创意的游戏，很容易让人们关注传记作者与作家，或是传记作者与作家、作品之间的关系，但是库切在小说创作中使用的自传元素并不能证明他所写的就是一部传记。当然，传记作者更容易犯“传记谬误”——在投射传记对象生平的过程中扭曲了其小说原本的意义。作家关于自己生活经历的再创作很可能误导传记作者，这一点传记作者要谨防，他不能把小说中的内容当成事实，他需要超越小说，在小说之外找寻事实真相。

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他就可以报道作家的写意人生，通过其写作对象为自己——既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创作的世界。这就是传记作者与小说家的不同任务，也正是这样，传记才具有一种传递真实的权威力量。

三

在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首先要感谢J.M.库切，是他欣然接受我的采访，并给我提供了他手头的文件。在写作过程中，他通过电子邮件回应了我提出的诸多与事实相关的质疑。他说他希望书中提供的事实都是正确的，但对如何诠释这些事实数据，那完全由我来掌握。他也不希望在该书出版之前看到手稿。凡是对他所提供文件的引用，我都已取得他本人的许可，其他的引文，或来源于他拥有版权的信件，或来源于尚未付梓的手稿，笔者也都逐一征得了他本人的许可。在这里，我也要感

谢库切的出版商，在库切的协调之下，他们允许我引用库切的出版物。对库切作品版权的鸣谢见于书尾。我也要感谢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是他们为我提供了库切的手稿和复印件。自我在2010年4月访问之后，这些藏品已转移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并永久贮藏在奥斯汀的哈里·兰塞姆人文研究中心（Harry Ransom Humanities Research Centre）。我要感谢得克萨斯大学允许我复印《幽暗之地》的一页手稿，并让我使用了很多其他资料。

通过库切，我结识了他的伴侣多萝西·德莱弗（Dorothy Driver），并对她进行了富有成果的采访。她安排杰里米·施韦尔特（Jeremy Schwert）——阿德莱德大学的一名学生，同时也是她同事的儿子，帮助我影印了库切所拥有的大量文件。

库切有一个表妹住在开普敦塔姆伯斯克鲁夫，名叫丽奈特·马基（Lynette Marki）。她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她所拥有的文件与照片，还帮我联系了库切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是她帮我安排在莫布雷对库切的女儿吉塞拉进行采访。在西博福特我与J.M.库切最亲近的婶婶，也就是他伯父桑（Son）的遗孀希尔维亚·库切（Sylvia Coetzee）进行了一次谈话。我也多次探访位于利乌哈姆卡附近美丽的百鸟喷泉农庄。该农场曾经属于库切的爷爷，也是《男孩》和《夏日》中的故事场景。该农场现在的主人是库切的表兄弟杰拉尔德·库切（Gerald Coetzee）。他带我参观农场，并指出哪里是小说中提到的场景。开普敦的斯蒂芬·韦梅耶（Stefan Wehmeyer）为我提供大量他所拥有的、有关库切母方祖先的详细资料。皮尔特·雨果（Pieter Hugo）和格哈德·戈尔登赫伊斯（Gerhard Geldenhuys）所做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通过莉迪亚·巴莱拉（Lydia Barrella）的协调，我在阿尔伯特王子镇的弗兰基·皮纳尔博物馆找到了库切祖父格里特·麦克斯韦尔·库切（Gerrit Maxwell Coetzee）的信息。莱恩斯堡旅游局也为我提供了关于百鸟喷泉农庄和相邻小镇麦威维的信息。

在隆德伯西的圣约瑟夫圣母学校，我采访了校长休·芬（Hugh

Finn)，并仔细查阅了库切在校期间的学校年鉴。我在开普敦大学（UTC）管理机构负责人纪尧姆·布鲁默（Guillaume Brummer）的帮助下找到的原稿与档案，详细记录了库切1957年至1961年读书期间，以及后来工作期间该校英语系所开设的课程。在这里我还找到了库切的两个孩子在该校学习的记录。国家英语文学博物馆的安·托里斯（Ann Torlesse）和她的同事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影印件，还两次欢迎我去那里担任研究员。在开普敦档案馆埃里卡·勒鲁（Erica le Roux）的帮助下，我找到了最高法院开普敦分院关于库切父亲杰克·库切（Jack Coetzee）的职业生涯的动议。在开普敦大学法医学名誉教授德翁·克诺贝尔（Deon Knobel）和一位律师朋友古斯塔夫·皮纳尔（Gustav Pienaar）的帮助下，我获得了有关库切的儿子尼古拉斯在警方的死亡记录，当时他刚年满23岁。我有幸能够与开普敦大学前教授、杰出的神经外科专家凯·德维利耶（Kay de Villiers）讨论了一些医学问题。在彼得·尼尔森（Peter Nelson）的帮助下，我联系到了库切在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前同事霍华德·伍尔夫（Howard Wolf），得以使用他存放在阿默斯特学院图书馆里那些他与库切之间的通信记录。

斯泰伦博斯的J.S.格里克图书馆文献中心的玛丽娜·布林克（Marina Brink）及时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该中心的米米·赛弗特（Mimi Seyffert）为我将许多库切的照片转为电子版。照片的所有者或者所有机构的名字见本传记中各照片。在开普敦国家图书馆，我查阅了大量的报纸和期刊，而这些都是斯泰伦博斯所找不到的。

我的朋友让·范德维吉特（Jan van der Vegt）——也是汉斯·安德留斯（Hans Andreus）、A.罗兰·霍尔斯特（A. Roland Holst）与亨德里克·德弗里斯（Hendrik de Vries）的传记作者——为我提供了荷兰报纸期刊中出现的大量有关库切的文章和评论。我也多次与赫尔曼·吉利欧米交流意见，他从本项目开始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波兰弗罗茨瓦夫大学荷兰语与南非语教授耶日·科赫（Jerzy Koch）阅读了本书部分章节，并做出了评论。艾蒂安·布里茨（Etienne Britz）详细阅读了每一章